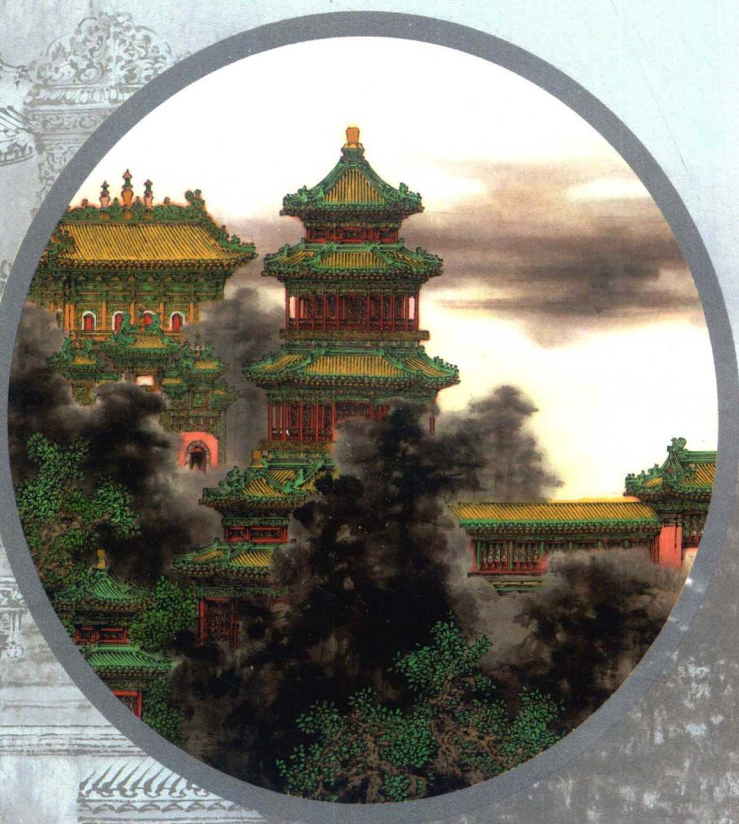




西洋影像中的“三山五园”

程龙◎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西洋影像中的“三山五园”

主 编 程 龙

副主编 张东旭 于佩丽 高 洁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洋影像中的“三山五园” / 程龙主编. — 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56-4307-1

I. ①西… II. ①程… III. ①古典园林—北京—图集
IV. ①K928.7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7764 号

XIYANG YINGXIANG ZHONG DE SANSHAN WUYUAN

西洋影像中的“三山五园”

程龙◎主编

责任编辑 禹 冰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长沙金鹰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2 千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三山五园”是清代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的总称，其中包括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五座皇家园林。在颐和园、静明园和静宜园中分别坐落着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三座较高的山峰，因此北京西北这五座皇家园林常常被概括地称为“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代表着中国园林艺术发展的高峰，其中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建筑和园林文化，也涵盖了宗教、民族、文学等诸多内容，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三山五园”是清代的政治中心所在，从康熙到咸丰的清代历朝皇帝都长期在“三山五园”园居理政，这里成为了比紫禁城还要重要的政治中心，是清朝接待外国使节的重要场所。“三山五园”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杰作，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就是在清代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修建的，其建筑样式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是西方造园艺术在清代皇家园林的典型代表。在近代历史中，“三山五园”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三山五园”遭到了劫掠和破坏，特别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更是被大火彻底焚毁，令人感到极为痛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三山五园”再遭劫难。在晚清最后的数年间，重新修建的颐和园成为了慈禧太后的驻所，这里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地方。

在“三山五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在各个阶段都参与其中。他们曾参与过“三山五园”的建设，作为到访的使节游览过这几座皇家园林，他们也是侵略者和破坏者，与“三山五园”的破坏有着

密切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保存了大量有关“三山五园”的影像资料。例如，他们曾绘制过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图纸、曾画过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水彩画；当照相技术发明后，他们又携带着照相机来到“三山五园”，拍摄了圆明园、颐和园、静明园和静宜园的照片。从1860—1911年，来到“三山五园”的西方摄影师前仆后继，拍下了各个时代“三山五园”的影像资料。

这些影像在研究“三山五园”的历史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本书便是对西方人所绘制或拍摄的清代“三山五园”影像资料的一次系统研究。这些影像资料散落于世界各地，搜集整理它们，并按照影像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它们，这样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本书即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人到来之前的“三山五园”	(1)
第二章 17—18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三山五园”	(9)
一、西方历史文献中的“畅春园”	(9)
二、《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15)
三、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	(24)
第三章 英、荷使节与圆明园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西洋影像中的“三山五园”	(44)
一、马嘎尔尼使团与圆明园	(44)
二、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与圆明园	(53)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西方人所拍摄的“三山五园”照片	
.....	(58)
一、照相技术的发明和引入中国	(59)
二、1860 年之前西方人在北京的摄影活动	(65)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摄影师所拍摄的“三山五园” 照片	(67)
四、英军摄影师意大利人贝托 1860 年所拍摄的“三山五园” 照片	(74)
第五章 1861—1900 年西洋影像中的“三山五园”	(86)
一、19 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在北京的生活	(87)

二、法国驻京外交官群体与“三山五园”影像	(93)
三、英国驻京外交官群体与“三山五园”影像	(106)
四、海关职员群体与“三山五园”影像	(124)
五、职业摄影师与“三山五园”影像	(163)
 第六章 1900年以后西洋影像中的“三山五园”	(173)
一、德国公使穆默的《插图日记》	(177)
二、小川一真《清国北京皇城写真贴》中的 “三山五园”	(182)
三、法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三山五园”	(190)
四、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的生活场景	(193)
五、山本赞七郎的“三山五园”照片	(198)
 结 语	(207)

第一章 西方人到来之前的“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这个词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即便是常年生活在北京的居民，恐怕也不见得知道它究竟是指哪些山和哪些园林。不过，倘若提起“颐和园”“圆明园”“香山”这些北京的名胜，恐怕就无人不晓了。这些清代皇家园林的典型代表不但在国内大名鼎鼎，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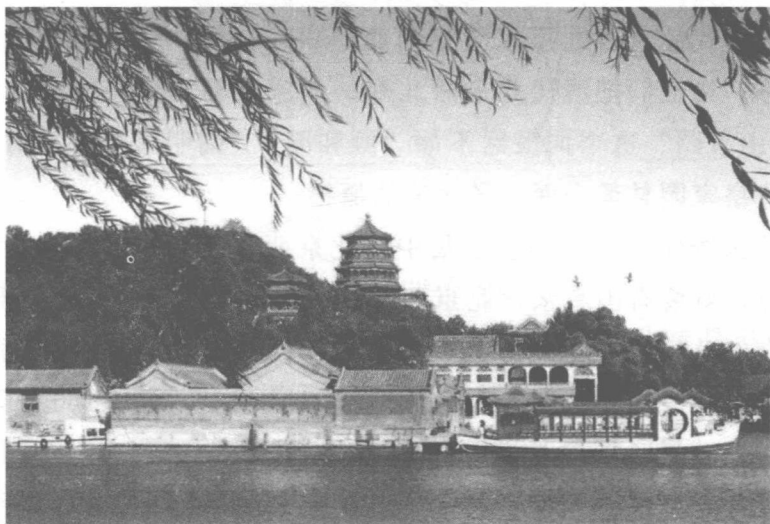


图 1-1 颐和园万寿山

清代时期，北京西北郊是皇家园林较为集中的地方，除了上面提到的“颐和园”“圆明园”“香山”之外，还有“玉泉山”和“畅春园”，一共是五座园林。这五座园林正式的名字分别是颐和园^①、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和畅春园，这就是所谓的“五

^① 颐和园在光绪十四年（1888 年）改建之前名为“清漪园”，1888 年以后称为“颐和园”。

园”。畅春园的旧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西侧。五座园林中有三座拥有较为高大的山峰，除香山和玉泉山之外，就是颐和园里的万寿山，这就是“三山”。对于颐和园的万寿山，大多数读者并不陌生，万寿山上的佛香阁是颐和园最为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在晴朗的日子里登上山顶，可以遥望京城；香山现在也是北京居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之一，秋天，这里满山红叶，景色十分宜人；从颐和园沿着北五环去香山，路的南侧也有连绵起伏的小山，虽然海拔不高，但山上的两座塔却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玉泉山。在颐和园里，举目西望，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座塔和周围的低山丘陵。由于今天它是中央机关的驻地，不对公众开放，普通民众虽然可以远远地望见它，却对它并不熟悉。这五座园林就是清代北京西北皇家园林的典型代表，而“三山五园”就是它们的统称。当我们把清代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时，“三山五园”这个词虽然不如“颐和园”“圆明园”那么有名，却是对这些皇家园林最全面、最简洁的概括。

为什么清代的皇家园林多集中在北京西北郊？答案非常简单，既然是园林，就要有山有水，北京西北郊就是一个集山、水于一体的地方。北京的总体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面是太行山脉的北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山”；北面则是燕山山脉的一段，叫军都山，密云地区的群山便属于燕山山脉。“三山五园”就位于“西山”脚下由山脉向平原过渡的区域。这里是山地和平原的结合部，山中的积水从这里流出，或形成泉水溢出在这里汇聚，便形成了一个一个小湖泊。这个地区今天属于海淀区，“海淀”是古地名，“海”和“淀”从字义上讲都有“湖泊”的意思，前者指较大的湖，后者指较小的湖。可见，当时这个区域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再如，沟通“三山五园”水系的一条河流叫“万泉河”，附近还有一个地名叫“万泉庄”，都反映出这片区域曾经泉水众多。不但有山有水，这些泉水、湖水刚刚从山中流出，质地清澈，尚未被下游的聚落污染，是最佳的饮用水水源，倘若再施以人工进行整饬，这里将是最为理想的园林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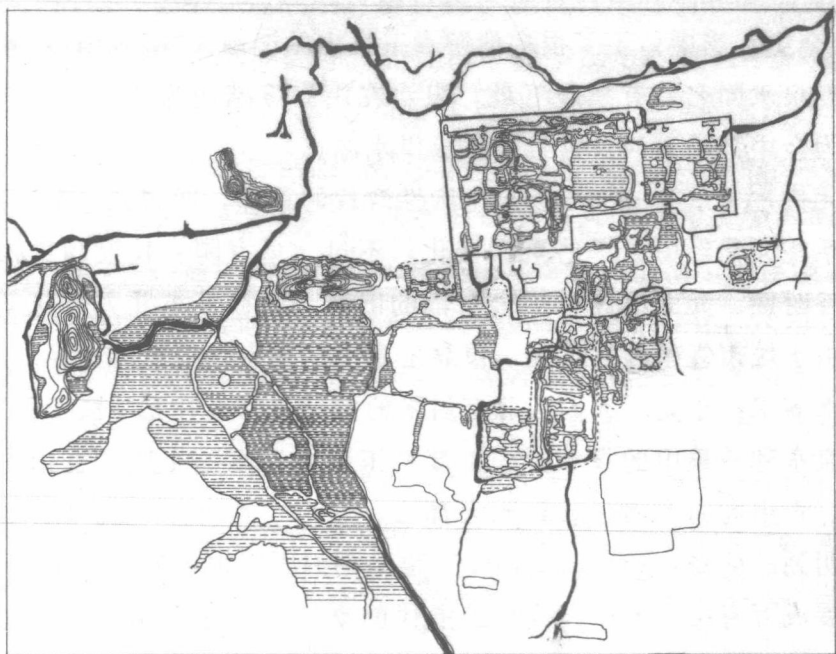


图 1-2 北京西北郊“三山五园”水系示意图

最先具备慧眼认为这里具有造园价值的是辽代的皇帝。辽代实行五京制，有东、西、南、北、中五个都城，今天的北京是当时最为靠南的都城，因此叫“南京”。在辽南京时期，西山已经成为皇帝驻蹕游幸的风景名胜，香山上的香山寺便始建于这个时期。

女真人建立的金代也把北京当作都城，但由于它的疆域比辽要大，已经扩展到黄河流域的开封，因此在金代的“五京制”当中，北京就不是最为靠南的都城了，而是在中间，它由此成了金代的“中都”。辽人在西山开辟风景名胜的做法深得金代皇帝的认可，特别是金章宗在位期间，西山的园林建设得到了巨大发展。香山和玉泉山都成为金章宗游幸、避暑和打猎的地方。辽代的香山寺被改建扩大，更名为“永安寺”，与周围其他佛寺一同变成了金章宗的“香山行宫”。在香山经营行宫毕竟是延续辽代在这里的“未竟”事业，金章宗显然不满足，为了显示与众不同，他独辟蹊径，在香山以东的玉泉山上修建了“芙

蓉殿”，并以此为核心开辟了“玉泉山行宫”。金章宗对玉泉山情有独钟，《金史》当中留下了很多他游幸玉泉山的记载。“玉泉山”，顾名思义，以泉水闻名，有泉眼五处，泉水在山脚下潴而为池，再向东南流去，为金中都的运河及宫廷园林提供水源。

元代，北京第一次成为了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即“元大都”。西山的水系在元代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不过，皇家园林建设却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元大都放弃了金中都的旧址，而在其东北方营建新的城市。由于城市规模骤然增加，单靠玉泉山的泉水已经不能满足“大都”的用水需求，于是，人们引北京昌平的白浮泉水来补充玉泉山的水源，白浮泉水和玉泉山的泉水要先汇聚在玉泉山以东一个叫“瓮山泊”的小湖，再由此向东南引导到元大都去。这个“瓮山泊”就是后来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湖边的小山——也是湖泊因以得名的“瓮山”，后来便发展成万寿山。不过，这都是清代的事，元代这里还没有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建设，“瓮山泊”仅仅是一个为首都提供水源的水利工程。修建元大都已经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而蒙古皇帝似乎也很满足于大都城内的皇家园囿——太液池，即今天的中南海，这大概是元朝皇帝并没有精力和兴趣再去兴建离宫别苑的原因。此外，短短九十七年的统治也没有给蒙古人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经营西山。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元代来华的西方人都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西山园林的记载。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为东西方之间的陆路交通提供了便利，因此，元代时期一些欧洲人长途跋涉抵达中国，开始了对东方的认识。此前，中国和欧洲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人员往来，但中国生产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等已经由陆地或海上的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人借助这些实物建立起对遥远东方的想象。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元代来华欧洲人中最著名的代表，他留下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虽然书中对元大都的宫殿着墨不少，但没有留下有关西山园林的只言片语，这和清代来华的西方人的著述形成了很大反差。现代有学者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提出了质疑，原因是他从未谈

到过中国的语言文字，他从没有讲过自己如何跟蒙古官员以及中国民众进行沟通，是有人替他翻译，还是他掌握了汉语？我们不知道。而其他所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要谈到汉语和汉字的特殊性。不过，马可·波罗毕竟写成了一本中国游记，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好，还是道听途说也罢，重要的是，这本书使欧洲人了解到了中国的建筑和园林艺术，在传播中国建筑和园林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明代时期，北京西北郊的自然景观又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南方来的大批移民在这里开辟水田，使这里出现了宛若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明代皇帝和皇后就很喜欢到这里游玩，《明史》对此有过很多记载。虽然明朝皇帝时常到西北郊游玩，但没有大规模在此修建行宫别苑，皇家园林建设也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明代的边疆形势较为紧张，蒙古虽退居塞外，但南下袭扰明朝边境的军事行动却时有发生。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中，不但明英宗被俘获，连北京城也险些被攻下。于是，明朝加紧了首都的防卫工作，花费了大量财力，在北京城的南面又增筑了一道城墙，即北京的外城。明朝政府本来打算把这道外城也延伸到城市北部，但由于财政吃紧，只好在修建了南城后作罢。北京西北郊虽然山水绮丽，但来自蒙古的军事威胁和财政上的捉襟见肘，让明朝皇帝也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在那里修建皇家园林的念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一些官僚贵族却在海淀一带占地造园，私家园林逐渐兴起。例如，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李伟就修建了清华园^①，书法家米万钟修建了勺园^②等，都为清代皇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末期，随着地理大发现的逐步展开，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也相继东来。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洋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并与部分明代上层官僚如徐光启等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长期生活在北京，通过展示西方科技和文化来推动天主教在中国

^① 此清华园虽然与今清华大学校园所在地名称相同，但位置却完全不同，在今北京大学校园以西。

^② 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园内。

的传播。他们也留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述和记录。例如，利玛窦本人就有《中国札记》传世。不过，这些著作中也鲜有提到北京西北郊的寺庙或行宫的。本来明朝的边疆形势就紧张，这些传教士抵达中国的时期是明代末年，蒙古、后金以及中原内地的农民起义都对首都北京构成了严重威胁，为安全起见，这些传教士自然大多时候只能待在京城中，更没有去西北郊游山玩水的兴致。这种担心也并非多余，明末清初的战乱的确对北京周围破坏极大，李自成的起义军就是从北京北部的昌平攻入京畿地区的，清华园和勺园等明代官宦的私家园林都毁于兵燹，无一幸免。

满族人入关以后，并没有像前几个朝代那样毁掉被推翻王朝的皇宫，然后大兴土木建设自己的宫殿。例如，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打算移都北京，他就把蒙古人修建的皇宫全部毁掉，其实这些宫殿曾经就是朱棣本人的王府，他在北平当燕王时还住了好一阵。朱棣在蒙古皇宫的南部另外择址，修建了紫禁城，把建设紫禁城挖出的土石覆盖在元代皇宫之上，形成了一座人工小山，他相信这样可以压制元朝的命脉，使其永远不得翻身，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景山”。当然，元代的皇宫就在景山下面，已经不得而见。满族人入关占领北京后，并没有像朱棣一样破坏前朝皇宫，相反却沿用了明朝的紫禁城、西苑等宫殿和园林建筑。这一方面是清初满族人为了统治汉人而表现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国祚初建，各地的反抗行动此起彼伏，经济和政治形势使清朝皇帝无暇顾及皇家园林的建设工程。要求汉人髡发已经激起了很大的民族矛盾，如果再把汉族皇帝的宫殿园林夷为平地重新建设，势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然而，满族人似乎总是不大甘心住在明朝的宫殿里，他们要寻找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热河行宫是清朝皇帝在夏日避暑的地方，但那里毕竟离政治中心北京过于遥远，往返一次要数月。就京畿地区来说，北京西北郊的这片山水就是更为理想的修建离宫别苑的场所。以女真人后代自居的满族人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仿效金章宗，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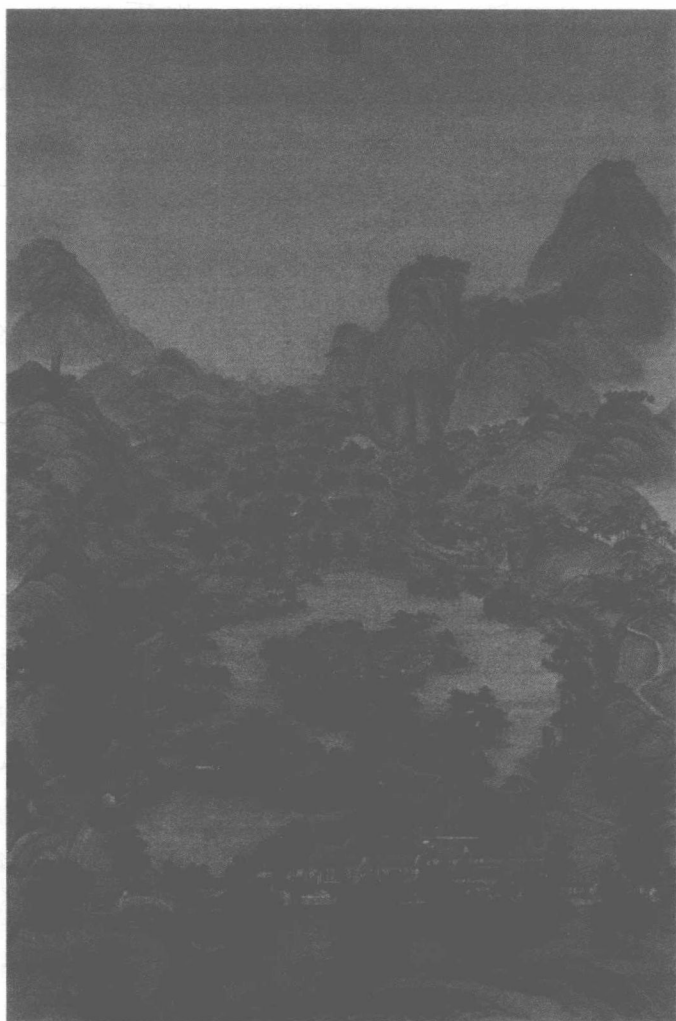


图 1-3 清代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

很合乎情理的做法。此外，来自东北关外的满族人很怕热，紫禁城里树木稀少，夏天住起来尤其炎热难耐，中南海和北海倒是有些水景，但植被难说是茂密，并且终归是建在平地之上，景观和地形都缺少变化，是不能和北京西北郊相比的。康熙中后期，满汉之间矛盾和各地反抗的严峻态势有所缓解，清朝的国力也逐步增强，而北京西北郊的园林建设也正是在康熙之后迎来了一个高潮。



图 1-4 康熙皇帝画像

1677 年，康熙皇帝在原香山寺的基础上扩建了香山行宫，开始了真正效法“金章宗”的行动。1680 年，玉泉山上原金代的行宫旧址也被利用起来，在其基础上建造了一座叫“澄心园”的园囿，1684 年改名为“静明园”。就在这一年，三十岁的康熙皇帝首次南巡，江南园林给他留下的印象极深。返回北京后，他便计划在北京西北郊修建具有江南风格的皇家园林——畅春园，其依托利用的就是明代清华园的旧址。畅春园的修建历时三年，于 1687 年竣工。从此，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康熙皇帝均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接见臣僚，畅春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也由此开辟了清朝皇帝园居理政的先河。由于畅春园的修建，在畅春园周围明代其他私家园林的废址上，也陆续建成了一些宅邸和花园。康熙皇帝把这些宅院分赐给皇室贵族以及官宦臣僚，以方便他们到畅春园来上朝。作为皇子的雍正也得到了一座位于畅春园以北的花园，时隔多年，当他即位大清国的皇帝后，他也把这座名为“圆明园”的园林扩建了好几倍，当作自己园居理政的地方。

第二章 17—18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 “三山五园”

一、西方历史文献中的“畅春园”

在清代的“三山五园”中，畅春园是最早建成的，也是第一个被介绍到西方世界的，而把畅春园介绍给欧洲的就是清代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洋传教士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从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去世后到清代初年，仍不断有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登陆中国。他们在清代的宫廷里任职，发挥各自在科技文化方面的特长，为清宫服务。这些传教士都秉承了利玛窦的做法，即允许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同时崇拜上帝、孔子和自己的祖先。这个折中办法是利玛窦等人在仔细研究了中国文化后得出来的权宜之计，因为他们很清楚，要中国人彻底放弃儒家文化和祖先崇拜，一时还做不到；为了传播天主教，只好暂时让中国人在接纳耶稣基督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的文化。这个做法的确减小了天主教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益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这件事被一些路过中国去往日本的传教士报告给了梵蒂冈的教皇，他们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自然不能理解利玛窦等人的做法。教皇便写了一封信给康熙皇帝，说上帝是唯一的，把孔子和祖先与之并列是大大的不敬，属于“异端”，应当立即改正。可想而知，康熙皇帝在接到这封信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绝大部分在华传教士驱逐出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欧洲传教士百余年来在中国开创的局面毁之殆尽，本来已经吸纳了一些信徒的“天主教”突然被宣布为“非法”，大部分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对中西交流来说，这些传教士的离开也是中国的损失。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不断把西方的科技知识传到中国，使中国能够了解西洋科技的进展。虽然这些科技仅仅被帝王贵族用来娱乐，并没有发挥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但至少这些科学技术被带入了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还能掌握西方科技发展的动态。二是这些传教士也承担着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重任，他们在写给欧洲亲属和友人的信件中，在发给欧洲教会总部的报告中，都介绍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况。他们学习汉语，研读中国典籍，与中国官员交流，掌握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欧洲各国也借此对中国有所了解。传教士被驱逐后，清政府不再接纳新来的耶稣会士，当留在清宫内的传教士们相继去世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而18世纪中后期正是欧洲发生工业革命的时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发明创造推动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中国却对这些发展闻所未闻，1840年国门再度被打开时，已经与外部世界隔绝甚久。

实际上，康熙皇帝对西洋科技也曾表现出极大兴趣，他在驱逐传教士时，也有所保留，将在宫廷内任职的传教士悉数留下，并常常请这些欧洲来华耶稣会士进宫为他讲解数学、几何等科技知识，觐讲的地点包括紫禁城养心殿、中南海瀛台以及畅春园。正是在历次入宫为康熙帝讲学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得以出入畅春园，并对这座皇家园林有了深刻的印象。

应邀到畅春园觐讲的传教士有法国人张诚（Geabillon Jean Francois, 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和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1708）等，他们都留下了有关畅春园的记录。

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在传教士中精选了精通数学几何者六人派